



老兵的性格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

在我国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许多优秀党员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在平凡的岗位上潜写了动人事迹。这本书反映的就是这些优秀分子中的十一名“开拓者”的真实故事。他们或者从实际出发，潜心探索我国实现四化的正确途径；或者披荆斩棘，勇攀高峰，在科学事业上开拓了新的领域；或者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原则，勇于创新，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乔厂长”；或者战斗在硝烟迷漫的自卫反击战线，用火红的青春保卫了人民的安全；或者在平凡的工作中对人民满腔热情，体贴入微，把党的温暖，精神文明传播给千家万户……每篇作品，都是一曲动人的乐章，每个人物，都是新长征路上的光辉榜样。从他们身上，将窥视到中华儿女的高尚风貌，催人奋进，令人图强！

目 录

夙愿.....	董克恭 (1)
老兵的性格.....	王润庭 (20)
探索者.....	高 非 (37)
春风拂煦万人心.....	谢 牧 (49)
在祖国的窗口.....	李 质 (60)
吐尽最后一根丝.....	夏国珞 (70)
黑暗的征服者.....	刘集贤 (89)
血与火的进行曲.....	鲁 滨 (112)
黑石头的歌.....	刘作舟 (128)
再见吧! 姑娘.....	钱 钢 (142)
青春的光.....	许焕岗 郑凯歌 (158)

夙 愿

董克恭

翻开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一篇叫做《对冶金工业现代化的一点认识和建议》的文章立即醒目地映入我的眼帘。作者是周传典，我认识他，是位冶金专家。冶金专家谈冶金，就够引人注目，这篇文章的题目更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这几年来，什么要建设十二个鞍钢呀，什么宝钢建设呀，什么要把现有的钢铁企业逐步改造得象宝钢那样现代化呀……。这样搞，行不行？好久以来人们在疑惑。作为冶金专家，又长期参与冶金科技领导工作的周传典同志是怎样认识的呢？他同意现在的作法吗？我有些替他耽心；他不赞成吗？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迫不急待地要将文章读下去，我急切地要从文章中得到回答。

周传典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对冶金工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什么是中国式的冶金工业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实现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当前主要是要立足于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建新厂，要在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的路子上继续发展，立足国内，能自己干的自己干，自己干不了的可以选购。

读着，读着，我的眼前拨开了层层迷团，心里解开了种

种疑惑，感到是那样豁亮，那样透彻。

文章读完了，我的手还在捧着报纸，久久不愿放下。我想再读一遍。但是，眼前一个个铅字却仿佛套上了一个个光圈，紧接着又穿起一串串光练。这条条熠熠发光的光练在不停地晃动着，它勾起了我同周传典同志所接触过的一系列片断……。

攀钢建设的回忆

“建新厂，要在攀钢建设的路子上继续发展。”这使我想到周传典同志对攀钢建设的一次回忆。

我第一次和周传典同志接触，是一九七九年五、六月间，在成都和渡口召开的攀枝花共生矿综合利用第三次科学会议上。会议期间，为了采写有关攀枝花共生矿综合利用的报道，我曾几次请他出出点子，介绍介绍情况。然而，身为大会秘书长的周传典同志时间很紧，他几次要为我安排点时间，结果到时候都被挤掉了。有一天晚饭后，他约我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钟一边散步一边谈。

这个月的攀枝花地区，白天气温高达三十度以上。因此，经后半夜的凉风吹拂过的早晨，成了最舒适的时候。

我们来晚了半个月，火红的攀枝花已经开过了。但是，攀枝花树是先开花后长叶，此时，正是嫩叶放长的时候，倒也别有一番情致。我和周传典同志一起漫步在渡口（攀枝花）市委招待所门前的一条柏油铺成的山路上。

“先从哪儿谈起呢？”周传典问我。我说：“先说说攀

枝花的地理环境和建设分布情况，好吗？”他想了想，然后说：“这很好，很好……”。

曦微之中，群山环抱着的攀枝花地区，镶嵌在一个个山坡上的灯光还没有熄灭，好似套着层层花环。周传典面对着闪烁的灯光，用手指点着：那座山头是兰尖铁矿，我国设计人员和矿山工人一起在那里创造了奇迹。兰尖铁矿高度达五、六百米，坡度百分之三十。如果按过去的设计方法，要修二百多公里的铁路，运输矿石的火车才能盘上山去，而修一公里铁路就要挖填土方二千四百万立方米。这样搞工程量太大，花钱多，时间长，难度大，怎么办？我国设计人员打破了传统的矿山设计方案，割掉了铁路，闯出了新路——他们创造性地采用平峒溜井的新设计方案，利用矿山高差运送矿石。你看溜井打在采矿场里面，矿石从溜井下去，然后通过板式给矿机便直接装到了矿车里。多妙啊！

周传典渐渐地兴奋起来，他把手指向了招待所的正前方：“那就是我国科技人员和工人凭借智慧和双手画出了无比壮美画图的地方——弄弄坪。”

弄弄坪只有二点五平方公里的场地，高差达八十米。按照某些国家的建筑法规定，建筑系数不能大于百分之二十三。而我们的弄弄坪地区，建筑系数却远远超出了他们这个标准。按惯例，钢铁企业的平面布置必须是“三大一人”，即“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工厂分布成人字型。按此要求，就要把山头推平，而且面积不能小于五平方公里。我国设计人员决心从实际出发打破这个框框，因地制宜地在这靠近

煤矿、依山傍水的弄弄坪上建成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他们深入群众作调查，爬山涉水看地形，顶烈日，冒风雨，踏遍了未来的厂区。他们会同有关生产厂矿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总图设计大会战。他们因地制宜，利用地形高差的特点，把工厂布置在十多个不同标高的台阶上。厂区布置紧凑，比过去同类型的企业少占地一半以上，将建筑系数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二到三十四。他们根据山区特点，采用皮带运输等多种运输方案，减少了厂区铁路，节约了大量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就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世界上顺山势建立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创举。

周传典同志正要继续说下去，大会秘书组的一位同志从后面上来，找他商量事情，于是，我只好在一旁等着他了。

这时矗立在弄弄坪上的高炉正在出铁，红色瀑布与东边的朝霞相辉映，是那样瑰丽多彩。我一边等待，一边在脑子里整理几天来的采访材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周传典率领一百零八将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难关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我国地质工作者从攀枝花矿区选出十九件矿石小样，送到苏联分析，得到的结论却是：高炉冶炼铁矿石，炉渣中含二氧化钛超过百分之十六就不能冶炼，而攀枝花矿炉渣中的含二氧化钛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更不宜冶炼。一九五八年，地质工作者和矿山工人又打坑道，取大样。通过人背、马驮、船载、车运，经过千辛万苦，又把一车皮矿样运到了苏联。但是，得到的结论仍和原来一样。就

这样，攀枝花矿被有些人认为是“镜子里的花，能看不能摘”。

我国科技工作者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一九六四年底，从全国十一个单位抽调了一百零八人，组成了号称“一百零八将”的试验组。周传典参与了试验组的领导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起，於一九六五年迎着困难进入承德钢铁厂，展开了攻坚战。

试验厂远离城市，条件十分艰苦，塞外寒风象刀子一样扎人。但是，一百零八将却个个热情满怀，毫不畏难。试验刚开始，就出师不利——没放出渣铁。高炉面临着危机。周传典和同志们一起冒着高温抢救事故。氧气没到，就一点一点地用钢钎抠；氧气来了，就争着用氧气烧。脸烧坏了，不下火线；腿打伤了，不下战场。苦战赢得了高炉转危为安。

初战的失利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辩论会。周传典不气馁，不退缩，坚定地向前探索。他和同志们一起研究了能够找到的几百份国外有关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资料，查阅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国内五次用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资料。他认为，资料中有益的东西可以吸取，可行的办法可以使用，但是，要走通国外没有走通的路，就不能重蹈国外的覆辙。经过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经过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艰辛的探讨、谨慎的比较，周传典和试验领导小组的同志一起，终于从一个又一个方案中选出了最佳方案。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试验组的一百零八将胜利地突破了国外一百多年来没能解决的技术难关，闯开了国际冶金工业中的一个“禁区”，

创造了攀枝花矿石可以进高炉冶炼的奇迹。这项重大研究成果，为攀钢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我的回忆被周传典的话声打断了。他问我：“谈到哪了？”我说：“弄弄坪”。于是，他又继续谈了下去。

“你看，那里是烧结厂。”他用手指点着，“当时国内最大的烧结机是七十五平方米，是按苏联的设计制造的。为了适应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的需要，我国自己设计、制造了一百三十平方米的大型烧结机，达到了六十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这时，他用手指着喷吐着红云的地方：“那是炼焦炉。当时，国内制造的焦炉最大的是58型，炉门高度四点三米。而攀枝花用上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大容积焦炉，炉门高度五点五米，每孔容积三十五点四立方米，既减少了占地面积，又增加了出焦量”。接着，周传典又为我介绍了高炉、转炉和轧机。当时，国内建造一千立方米以上的大高炉，都是用苏联的设计图纸。在攀枝花建造的一千立方米以上的高炉，不仅是我国自己设计，而且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攀枝花所使用的自己设计、制造的转炉是一百二十吨，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最大转炉——进口的五十吨转炉。同样，在攀枝花也用上了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当时最大的初轧机和轨梁轧机，并首次采用了先进的可控硅技术……。

周传典越说越兴奋。他对我说，一九七二年，他到攀枝花参加技术攻关时，看着我国自己独创的一项项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越看越高兴，满怀豪情地投入了攻关战斗。从实践中，周传典深深感到，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新一代

设备，更容易掌握。

战斗者的回忆是幸福的、甜蜜的。战斗者也会从回忆中为前进总结出经验。周传典回顾攀钢建设的历程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对我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在我国冶金工业发展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我国冶金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你要写，就写攀枝花的道路。”

也许，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我说：“看来，攀钢建设的路子走对了。那么，今天发展我国冶金工业走建设宝钢的路，又怎样理解呢？”

正处于异常兴奋状态的周传典，听了我提的这个问题，沉默了一段时间，才严肃地说：“这里有不同的认识，时间已经很长了。”

一九七五年，周传典曾参加了谷牧同志召开的如何加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座谈会。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一个方案：采用日本的办法，沿海建大厂。设备，全部从国外引进；矿石，也从国外进口。周传典以攀钢建设的成功实践为根据，认为不能走这条路，主张立足国内，在攀钢建设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粉碎了“四人帮”，人们渴望尽快实现四化。但是，面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怎样才能实现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周传典为此日夜苦思深虑。当时，外国人蜂拥而来，我们也一批批出国考察。在十年动乱之中，周传典和许多同志一样，对国外的情

况无从了解。此时，他急于掌握国外情况。没有机会出国考察，他就尽力收集从国外介绍进来的关于冶金现代化的资料，研究一些代表团的出国考察报告。他从大量的材料中，概括出国外冶金工业现代化的“六大水平”，即：设备大型化，操作自动化，连续化，生产高效率，能源消耗低，钢铁优质量，环境污染少，为了达到这六大水平，国内有些同志主张学习外国，新建一系列象宝钢一样的大厂。

面对这种主张，周传典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潮又掀起了波澜：“全部买进设备吗？”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制造能力，为攀钢制造的设备不就是有力的说明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全买？“全部进口矿石吗？”我们同日本不一样，我们是有着丰富铁矿资源的国家啊！何况，设备、矿石全部从国外买，买得起吗？总之一句话，这种方案究竟符不符合我国国情？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和深思熟虑，使周传典进一步坚定了信心，不能走这条买现代化的路，还是应该走攀钢建设的道路。

改造鞍钢的争论

要深刻理解攀钢建设的道路，就要对我国冶金工业发展的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为了了解这部历史，我很自然地又想到了周传典同志。

周传典一九四七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一九四九年奔向解放了的鞍山。一九五八年，他又转战武钢。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除去在苏联学习一年时间外，他一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他就担负起主管全国最大的

炼铁厂生产建设的重任。他从见习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从高炉炉长到厂长，一直战斗在冶金第一线。周传典同志在鞍钢恢复时期，曾荣立特等功，同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劳动英雄孟泰等一起，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周传典也曾带领专家组到国外进行技术攻关，并荣立援外特等功。一九六三年，周传典又调到冶金部机关工作。他曾在冶金部炼铁处主管过全国炼铁生产技术工作，也曾跟随高扬文同志进行过攀枝花、贵州、云南钢铁工业发展的规划工作。作为冶金部科技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近几年，他直接抓攀枝花、包头两大共生矿综合利用的科研工作。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冶金科学的发展做不懈的努力。他现在是金属学会炼铁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冶金部钢铁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邀学术委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从一九五二年起，他每年都要拿出一至两篇技术论文，到现在为止，已公开发表了二十多篇。他参与领导和研究的攀枝花矿冶炼试验，荣获了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多方面的工作，使他了解了我国整个钢铁工业发展的情况；多年的潜心钻研，形成了他对我国冶金工业如何发展的真知灼见。

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又挤出了一段同我谈话的时间。那是一天晚上，会议安排了一场电影，他没有去看，而是在脑子里象过电影一样，一边陷入了回忆，一边向我展开了叙述。

他首先问我：“你去过鞍钢、包钢和武钢吗？”我回答他：“不但都去过，而且生在鞍钢。应当说，我的岁月主要

是在钢铁城市度过的。在鞍钢生活了十几年，在包钢又生活了十几年。我父亲作为老工人，一直参与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

听过我的回答，他的眼睛忽地亮了起来，他问我父亲在鞍钢的时候，在哪个公司工作，我告诉他是高炉公司。他一听更为高兴：“噢，那我成天和他们打交道啊！他们是建设单位，算乙方；我们是接收单位，算甲方。作为甲方代表，我曾参与六座高炉的建设。”

这出乎意料的开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昔日的战场：在那沸腾的工地上，脚手架林立，指挥起重机的哨音和工人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面面红旗迎风猎猎飘扬。在那白天争分夺秒，夜里挑灯夜战的日子里，他有无数个夜晚，都是以工地为家，裹衣而眠。他眼睛上的红丝还没有褪净，又手拿火炬，点燃起另一座新建的高炉，喜悦的泪水怎能不夺眶而出。在那火红的年代，为了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周传典和同志们身边簇拥着铁花，双手引出了条条金龙，为了夺铁保钢，日夜挥汗如雨。

周传典从遐想中回到了现实，他看了看我：“看来你对祖国的钢都，钢城很有感情了？”我没有回答，也无需回答，因为我清楚，这也是他自己此时内心的真实表白。

我见他完全陷于幸福的回忆之中，本不想破坏他此时的心境，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考虑他时间的宝贵，我还是提出了也许将触痛他的问题。不过，这次我说得委婉一些罢了。

“前些日子，亲戚从鞍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谈到，鞍钢拆掉两座高炉，新建一座，他想不通，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来头……。”说到这里，我有意将话打住，用目光期待着周传典的解答。

我的话真的挑动了周传典，他脸上的肌肉立刻绷紧了。他想了想，很带感情地谈起了这个问题。

一九七五年，在谷牧同志召开的如何加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座谈会上，周传典曾经提过这样的意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要着眼于对现有老厂进行挖潜、改造，使之形成真正完整的而不是局部的，实际的而不是名义的综合生产能力。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实现四化，有的同志觉得周传典和一些同志的这种认识跟不上形势，主张将原有钢铁企业改造成达到“六大水平”的大厂。这场争论突出表现在如何改造鞍钢的问题上。有一种意见主张：推倒鞍钢现有的十一座高炉，重建六座高炉。首先推倒两座各有一千多立方米容积的高炉（这在我国已属大型），重建一座2500立方米容积的高炉。面对这种意见，鞍钢的一些技术人员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写信给周传典，想得到他的支持。这进一步引起了周传典的思考：鞍钢的一座座高炉曾经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它们真的不适用了吗？真的成了实现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吗？周传典思绪万千，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经请示领导，他把鞍钢炼铁厂、机动处以及有关单位的同志找来，开会讨论。

解放后鞍钢新建的高炉是采用苏联五十年代的生产技术

设备和按照苏联设计修建的。（当时，在冶炼方面，苏联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先进的。）在讨论会上，周传典提出：“这些设备今天在国外是否都淘汰了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回答。”在未能得出准确的答案之前，周传典算了一笔帐：现在要拆除两座高炉，总容积两千多立方米，而要新建一座，比这多不了几百立方米。特别是在原料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并不能多生产出生铁来。另外，拆除两座高炉，在原地新建一座2500立方米容积的高炉，所需费用和大修这两座高炉及另外再建一座新的2500立方米高炉的费用差不多。我们为什么不取后者呢？这样在经费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就可以比拆除方案多得到一座2500立方米容积的高炉。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赞成这个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没能被采纳。以后发生的客观事实，证明这次会议的分析是正确的。

一九七八年，鞍钢又要拆掉两座高炉，然后再建一座新的。似乎不拆旧的另建新的，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周传典闻讯，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奋笔疾书，再一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提出了和周传典同志相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冶金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两座高炉保住了。

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请外国人对首钢进行改造，把首钢也建成象宝钢那样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大厂。结果，外国人要价很高，仅把首钢从一百多万吨钢提高到三百万吨钢，就要几十个亿。这要超过兴建攀钢的费用。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逼迫着周传典不停地思考：对我国现有的钢铁企业到底如何进行改造？是在原有基础上挖潜、革新、改造，还是把现有企业都逐渐改建成宝钢那样的大厂？按前一种意见，能否实现冶金工业现代化？按后一种意见，是否就真能够实现冶金工业现代化？

看电影的人们已经散场了，我怕时间拖得太晚，影响他的工作，就告辞了。至于怎样实现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我想起了他在成都时所作的出国考察报告。今天晚上，我似乎理解了周传典所以做那场报告的用心。

出国考察中的思索

如何建新厂？如何改造老厂？如何实现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在那些日子里，周传典的思想陷入了矛盾和苦闷之中。坚持自己的意见吧，又达不到“六大水平”；赞同另一种的意见吧，心里的疑团又解不开。周传典急切地想到国外看看冶金企业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国外的冶金工业现代化是不是都是那“六大水平”？

周传典的愿望实现了。一九七九年四月到七月，他去西德、美国和日本考察。

周传典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行驶在现代化的城市——西德时，那些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现代化用品，并没有把他的视线全部遮住，他看见了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地行驶着的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在我国有的大城市都已淘汰，为什么在西德现代化的城市里还保持至今？周传典从中受到了启发：

出国考察，先进的东西固然要看，落后的东西也应当看，看他们是怎样使用的。周传典有意地向接待单位提出了要求：七十年代建设起来的高水平的新厂，我们想看；过去建设的老厂，我们也想看。负责接待的外国朋友以惊奇的目光看了看他，最后，满足了他的要求。

在西德和美国考察的日子里，周传典看到在这两个国家的冶金企业里，有许多厂是现代化的东西和古老的 东西 并存。铅室法生产硫酸，在我国已经不用了，可是，西德还有一家铁合金厂至今仍然使用这种古老的方法。用竖炉法氯化，在我国几个钛厂都不使用了，可是，美国最大的钛公司仍然在使用。在单机架轧板机上，用人工拿着大夹子传送轧制板材，这应当说是够落后的操作了吧，但是，供应美国喷气飞机、卫星所用钛板的美国主要厂家，却硬是用这种落后工艺轧制钛板。

为了了解全貌，周传典对这两个国家的冶金工业进一步作了调查。结果是：目前，西德和美国各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冶金工厂同时并存。从比例上看，七十年代的工厂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工厂占大多数，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工厂仍占相当比重。后两种的总和约占这两个国家现有生产企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这些工厂的主体设备和我们现有工厂的主体设备大致相当。他们有没有同我们不同的地方呢？有！那就是他们对一些老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装上了自动检测和新控制系统，在各工序之间采用了一些新设备、新技术。